

總序：四書人語	1		
李祖澤序	3		
平地一聲雷： 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8		
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 ——對沈從文先生的片斷回憶	22		
《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代序	28		
吉兆胡同東巷3號：歷史不能忘記	30		
道不遠人——我認識的啟功先生	35		
書緣世誼十五年——追憶陳從周先生	53		
附：編輯和作者——從兩本書想到的（唐振常）	67		
考古大師蘇秉琦先生劃時代之作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71		
「故宮三書」出版手記	82		
出版人生添風采——故宮因緣三十年	90		
涓滴之水可以成江河 ——《國寶薈萃》的出版與兩岸故宮的合作	102		
君子之交的楊新先生	110		
天書敦煌 ——《敦煌石窟全集》的出版故事	119		
		何炳棣「含着熱淚」寫《讀史閱世六十年》	128
		由《笑文匯抄》說到鍾華楠先生	139
		來龍去脈——《成吉思汗原鄉紀遊：另一種文明的體驗》前言	148
		附：《成吉思汗原鄉紀遊：另一種文明的體驗》序言（魏堅）	152
		馳騁於中國文明的時空 ——關於《中國地域文化大系》的編輯構想	159
		《看見中國：文物裏上下五千年》序	168
		出版的啟蒙導師——陳原老	173
		出版人的使命：我讀陳原	176
		近代革命知識份子的足音——讀《陳原散文》	186
		陳原老一個未酬的志望	192
		附錄 依然白髮一書生——訪陳萬雄先生（潘翠華）	202
		後記	219

平地一聲雷： 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我之能親近晚年的沈從文先生，緣於他的學術鉅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出版。我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出版工作，以至於今，幾十年來，持續不斷、鏗而不捨地致力於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圖錄的出版，乃至其後醉心於中國文明史的探索與弘揚，也是來自沈從文先生的影響與閱讀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啟迪。

1980年初起，香港商務印書館之出版大型圖錄，乃《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發其端。該書出版的成功，自此確立了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型文化圖錄的方向，隱然成為出版傳統，以至於今。關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香港出版的緣起，當事人藍真先生和李祖澤先生都曾撰文說其梗概。曾擔任港館總編輯的張倩儀女士也曾撰專文介紹。我在這裏憶述的，是親身經歷的一些拾遺補闕的事情。

1980年1月，我入職香港商務印書館時，《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書稿已是編輯出版的最後階段，無緣參與編輯出

版的全過程。對出版之前的過程，略有所聞，所知不多。我參與的是該書後期的推廣宣傳工作。我的閱讀習慣，非自己研究和興趣專注範圍的著作，常「不求甚解」，只求得其大要。然而，對尚未出版、亦非自己研習範圍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最後的校對稿，我閱讀多遍，細心咀嚼，甚至反覆斟酌推敲，以求甚解。所以一改以前陋習，一，此書的課題和內容對我太陌生了，要有個明白和了解，才可以做好宣傳推廣的工作。二，一翻閱該書，就給迷住了。自問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閱讀興趣廣泛。但是，此書的課題和內容，卻軼出我之前認識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另有天地。我是讀了該書，才認識到常掛在口邊「中國是衣冠王國」的歷史面貌。以往中國人自詡為「衣冠王國」，只是人云亦云，成了一句虛言泛語，對所謂「衣冠王國」，沒有多少實質與具體的認識。可以這樣說，除了個別專家學者外，眾多的文史研究者，也包括我自己，只是句口頭禪，實沒有多少了解。各種古舞台劇上的戲服，就成了一般人對古代服飾的印象。對幾千年來中國歷代服飾樣式的演變，編染織刺繡技術的發展，以至圖案的特色等，都不甚了了。直到閱讀了沈老此書稿，對所以為「衣冠王國」的中國古代服飾，才有個基本的認識和理解。對我更有啟發的是，沈老在著作中，通過對歷代服飾的研究，同時疏解了不少歷代文化思想、社會風俗、工藝

技術發展等不同層面的不同問題，觀點新穎，令人耳目一新，大開眼界。他的研究方法，正合乎二十世紀在西方興起、在人文學科研究上的所謂「個案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法去評估沈老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亦足以視為研究上的典範之作。我有點不明白的是，從未留過洋、受過西方式學術研究訓練的「土學者」，生活在相當封閉、與外國缺乏學術交流的時代，如何創用了這種研究方法？我個人理解學術研究範圍廣闊，主題不一。研究者重要是能因應課題和研究內容，找到一種最適合、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不必從眾從流。簡單地從眾從流，反窒礙研究的成效。反之，能因應課題和內容，而推敲出最佳的研究和表達方法，就有創新。我相信沈老是後者，因為他是長於思考的智者。我也留意到，不僅在學術的研究，他的文學創作，其實也很講究方法。對沈從文先生這方面的研究，學者少所涉及。

沈老這本書，不僅是首部理出古代幾千年服飾史的發展脈絡的著作，同時帶出了不少待研究的課題和研究方法，促使了我在研讀中國歷史文化時在觀念、思路和視野上的轉換，也吸引了我對過往輕忽的中國物質文明史的傾注，從而也影響了我所從事的編輯出版的思路。

如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以來內地的圖書出版，是「萬馬齊喑」的時代。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與開放的肇

始，內地學術著作的出版，除了一些考古的圖書外，個人學術著作的出版，以郭沫若的《杜甫與李白》與章士釗的《柳文指要》的面世為最早，亦最為海外文化學術界所矚目。另外就是以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最受關注了。這種情況是可以想見的。一是長達十年之內，這樣有名聲、有學術地位的學人終有新著面世，自然先聲奪人。尤其沈從文先生的新著，課題新穎鮮麗，如出水芙蓉，孑綦吐芳，讓人驚艷。何況是一本煌煌圖文並茂的鉅冊。其次，解放之後，作為近代有數的著名文學家的沈從文先生，在大陸、在台灣，都打入別冊，沉寂了好幾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結束，沈先生不僅有新著出版，而且是一部讓人一新耳目，也出乎人意表的著作。不是文學的創作，而是歷史考古學的範疇，所以更受人矚目和議論了。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時，我只是一個新進館的編輯，對其時香港商務印書館的財務和經營狀況，所知甚少。但在短短的工作日子裏，也感受到，以當時館內的經營條件和人力物力，出版此書，真是傾盡全力而饒富魄力的大事。此書不僅部頭特大，而且圖文並茂，裝幀設計與印刷包裝的華美，在當時的中文出版界，可算是一時無兩。

我參與該書出版的推廣工作，主要是撰寫推介文字、組

織學術座談會等。商務為此並舉辦了一個有份量的學術界座談會。憑記憶，出席座談會的學者可不少。有中文大學牟潤孫教授、王德昭教授，香港大學趙令揚教授等，還有不少大傳媒人。無論在座談會還是會後的飯局上，與會者對此書討論得很認真，很熱烈。與會者各以不同的專業角度，充分肯定了沈老此著作的創新、創見、水平、成就和價值，也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其中印象最深的幾項討論意見，我還記得住。譬如說，精研中西交通史的業師王德昭教授，以沈著中提到琉璃的出現和性質問題，特拈出以說明沈著所涉及文化問題的廣泛，發千年之曠。另有意見說到，該書的著作體例有點不純，結構也有些奇怪。本人在閱讀校對稿時也有同樣的感覺，並質疑館內編輯部未做好編輯工作。對這個問題，著作者沈先生不在現場，我們也無從作答。書出版後，我到了北京，沈老對座談會上的反應很關心。來京之前，我們陸續寄上座談會及其他傳媒報道的材料讓他了解。說到座談會，我也以在座者的身份，向他描述了與會者的反應和討論的問題，當然也說及該書的結構和體例的問題。在這方面，沈老向我作了解釋，才曉得其中的緣由。他說，該書所以命名為「研究」而非「概論」、「綜論」的，是由於該書的內容並非一本完整的中國歷代服飾史，而是一本順着歷史時代，對中國古代服飾的專題研究的專著。著作除了討論服飾

問題外，亦是透過與服飾相關的文學、文化、藝術以至歷史上諸方面問題的討論的專題結集。在報章上我寫了一篇推介文章，還記得是以〈博大精深〉為命題的。幾十年過去，當時用「博大精深」命題，並無誇大。至於對其體例不大完整的質疑，是出於誤會。日後，與沈老最得力、最親近的研究助手王弉先生和王亞蓉女士交往日密，才清楚沈老原有一個龐大而系統的「中國服飾大系」撰寫出版計劃，所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只算是這個大系的提綱挈領的序篇而已。

不過，從學術著作和編輯出版的嚴格要求，全書的結構確存在不完整的部分。日後洽談出版外文版的時候，對方屢有要改動一些結構的要求。我們轉達了他們的意思，沈老就是不同意。在那個年代，中文圖書能出外文版的，真不容易，有這種機會而出版不了，我們有點納悶。若干日子後才了解，《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原稿的結構，是19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看過的，並批示可以出版。沈先生為感懷周總理，一直要求保存原貌出版，不願作任何的改動。幾十年前，從舊歷史階段轉過來的老知識份子，對周恩來這種真摯的心情，或許不是現在的人所能理解的。

時光荏苒，事過境遷，現在可以說出另一個啞謎。沈老這本書出版了，當時各方面都奇怪香港商務印書館何以不邀

請他老人家親到香港會會文化學術界朋友，甚至有責備之意。據我事後了解，本館曾做了多次申請，努力爭取，可惜都不獲批准，不知環節卡在哪裏？主持者不想挫傷剛恢復社會活動的沈老的心情，讓他失望，只好捂着不說。那時候剛開放，這些難於理解的事情時有發生呢！

為推動「中國服飾大系」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為沈先生他們成立了一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室」，地點設在朝內大街吉兆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內，但只佔整座四合院的前、後兩廳房，兩邊廂房另有人家。據說這座四合院原是民初北洋軍閥段祺瑞管家故居。即使沈老去世，這裏長時間仍然是他的助手、著名考古專家和文物修復專家王予先生和王亞蓉女士從事研究的辦公室。說到這個地方，也是我到北京公幹幾十年跑得最頻密、亦是最難以忘懷的地方。

沈老在世時，我們總是到他府上拜訪他。記憶中從未在其他的其他地方，也未一同往外用餐。只一次，我們分別晚飯後，齊集在四合院的內廳房。沈老親自來到這裏，為我們一眾講解新出土的戰國江陵楚墓的文物幻燈片。這座戰國楚墓的發現，很轟動。最突出的是出土了大量的服飾。王予先生和王亞蓉女士都是參與發掘的重要人員，所以有第一手資料。沈老一張一張的為我們解說，娓娓道來。令人驚艷的出土文物，沈老深入淺出的解說，對我來說，不僅大長知識，

大開眼界，在學術認識上，有如醍醐灌頂，明白到中國歷史和文化另有天地，不是我熟知的。在歷史上，楚國雖然立國有七百年之久，跨越了東周末年和春秋戰國時期。在戰國之前，相對中原諸國，被視為野蠻之國；在戰國，雖列為七雄之一，留下的歷史印象總是文化上的後進國。經沈老一說，才豁然明白了代表「南方之強」的楚國，其文化之發達，楚民族和楚文化在建構日後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上的重要性，是被低估的。自此，對如何研讀中國歷史與文化，開了竅，張了眼。講解時，沈老全情投入，充滿激情，濃厚的湘西鄉音，聲調鏗鏘有致，至今仍印象難忘！日後，每次探訪中，聽他講及鄉土種種，他的神情和聲音，總是如此，眼睛閃爍着光芒，照射過來，耀着希望你會明白的期待，讓人不難感受到，他對楚湘鄉土和文化的熱愛和感情的真摯。這種熱愛和感情的真摯，既見於他的文學作品，也見諸於他的文物歷史的研究。

王予先生和王亞蓉大姐為了完成沈老定下的「中國服飾大系」，無論沈老生前到去世，始終全力以赴，這種對學術、對沈老遺願無咎無悔的精神，感動了我。譬如，中國各地有新文物遺址的挖掘和文物出土，只要牽涉及服飾，他們兩人都會憑着他們在古代服飾上的學問和整理出土織繡類的「絕藝」，不辭勞苦的趕赴各地「做義工」。一方面固然

出於學術職責所在，一方面也是為了能親身現場參與，以及取得出土有關服飾的第一手材料，以備研究之用。當時「服飾研究室」的經費相當拮据。為支持他們的研究工作，香港商務雖然百廢待興，經濟並不充裕，我們也不時提供攝影菲林等費用，並答允立項，如果書稿完竣，承擔出版。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動機，商業考慮不大，為的是協助完成這項在中國文化上的偉大學術工程。我的前任總經理李祖澤先生與我，在重要的學術文化的出版項目上，都有相同的傾向，以學術文化的價值放在第一位。待接了手要安排出版了，才竭盡心力考慮如何在經營上操作，能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至少可以持平。從事文化出版，這種考慮其實蘊藏着一種出版業的本質和經營道理。早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其後的《紫禁城宮殿》、《中國中草藥圖錄》（14卷）、《姑蘇繁華圖》、《中國歷代染織繡圖錄》、《中國地域文化大系》（6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以至《漢語大字典（電子版）》等等的出版，無不先考慮其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且各時期的各項大出版的工程，都是在經濟上勉為其難的情況下去啟動的。這種出版思路，似乎與商務印書館前賢的出版傳統，一脈相承。企業文化的傳承，自有其自覺與不自覺的影響在。

自1980年8月我首次赴京，乘便並辦點什麼事，到沈

老府上拜候，這是認識沈老之始。翌年，因出差上京，剛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新出版，遂由我帶上四部樣書交付給沈老。自此直到他的去世，或公事或探望，每次到京，總到他府上拜候聊天。記憶所及，談的都是文化學術尤其是考古歷史的事情。有時或及時事新聞，話題也離不開文化。沈老的湘西話不容易聽懂，幸好每回拜訪，總是王弉先生和王亞蓉大姐陪同，有他們在旁做翻譯和解說，才能常一聊好幾個小時。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香港一出版，立刻引起國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關注。由於剛開放，銷聲匿跡了幾十年的沈從文先生，研究他的文學的學者或服飾研究的同行，總是透過我們與沈先生聯繫的。如日本著名中國研究學者丹野郁等，都透過本館，與沈老聯繫上的。又如後來以著有《沈從文傳》而聞名的美國金介甫教授（Jeffrey Kinkley），先來到香港，與我們接上頭，再安排到北京會晤沈先生的。美國著名的《國家地理雜誌》，有一期主題是關於亞洲絲綢技術和生產的專號，也是先到香港，向我們了解了情況，並為他們作先容，再多次到北京訪問沈老和王亞蓉等。

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和近代文學學者藤井省三，撰寫專文評論沈從文先生，特別討論到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說：「他的序言，貫透全文，表現了旺盛的實證研究

精神，對中華文明有着無限的戀惜。」並說：「對沈從文來說，《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和《邊城》等小說一樣，優美而健康，且滿溢人性地刻畫了悠久的中華文明的時空。」

學術界以外，書出版後引起中外出版界的垂注，也是很自然的。香港出版不到二個月，台灣已有盜印本出版了。我們買了盜印本，送上北京給沈老，我們也想辦法與盜印的出版社交涉，不得要領。當時兩岸三地未開通，這種盜版情況很普遍。為台灣盜版事，沈先生有過來信訊問，我們亦如實奉告。但幾十年後，看了北京商務版的《沈從文晚年口述》一書，沈先生給作者的信中，曾大段的說到台灣盜印本的問題。由於對外隔閡太久，信內的不少猜測，當然是不了解情況下的想法。八十年代初之前，港台盜印流行，他們不了解而已。盜版的斷絕，是往後中文出版走上現代化的其中一項標誌性的進步。

當時的中文出版界，與國際出版界來往甚少，版權買賣更少。風聞沈從文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出版，歐美和日本的出版社紛紛透過不同渠道，要接洽出版。但考慮到外國讀者的閱讀可能，也考慮翻譯古文的困難，都提出出版簡約本。基於能出外文版，可作文化交流，我們很願意促成其事。為此我去信或當面反覆向沈老解釋說明，可惜沈老卻堅持要按原版的面貌出版而不果。直到沈老辭世後的 1991

年，沈夫人張兆和先生曾給我信，說日本里文出版社擬翻譯出版。這出版社從未聽說過，亦不知意圖，最後亦未有信息。

若干年後，一次在參加台北的書展，瑞典著名漢學家，亦即是推薦沈先生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馬悅然教授，特別託台灣文化記者、就是他現在的夫人陳文芬女士，約我午茶聚談。馬教授約我的目的，是他策劃找人資助和翻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翻譯好後希望香港商務印書館能出英文版。聽了，我一口答應。為了此事，馬教授熱心的奔走了好幾年。在香港和其他地方，都曾多次約見商談此事。最終，或因翻譯太難，或有其他原因，未能成事。在與馬教授的交談中，他一再表示，他很讚賞沈從文先生的文學天份和成就，亦因得獎即將公佈前，沈先生溘然而逝，未能因他的推薦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而留下無限的遺憾。諾貝爾獎的規定，獎項是不頒予過了世的人的。

由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的結緣，此後香港商務再出版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龍鳳藝術》、《沈從文文集》等著作。又出版著名考古學家王昶先生的《日偽時期煤礦坑的故事：山西煤礦萬人坑發掘記事》，王亞蓉女士的《中國民間刺繡》和《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等。這些著作都是香港商務首先出版的。順便一提，由於出版了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香港商務接連組織出版了《中國服飾五千年》、《中國染織繡圖錄》等大型畫冊。連帶以上的《中國民間刺繡》，可以說在八十年代，香港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古代服飾和織繡一類題材出版的開拓者。

沈老生前，對香港商務印書館開闢了有關中華文化圖錄的出版取向，時常予以鼓勵和讚許。在多次談話中，應該是他中風前的事，關於出版圖文並茂的文化圖錄，說了他的一些意見。記得起歸納起來，他的意見是：一，今後中國的歷史文化的研究，應該重視文獻和實物的結合。這種意見，今天學術界是很認同的，四十多年前，這種說法和做法，並不多見。結合文獻歷史和考古文物的歷史文化類的出版物也很罕見。其次，沈老老叨念地說，結合圖錄的著作和出版，甚至關於中華文明的著作和出版，遠比外國落後，要趕快追上去。他常慨嘆日本人很懂得利用中國的出土文物去研究，去寫作，去出版。再是，沈先生屢屢強調，中國文物實物的研究，不僅可增強學術的研究，同時可以古為今用，促進新的生產。沈先生以上這種論調，翻閱他的著作，在五十年代，已曾反覆強調。人類踏入二十一世紀，各國各地最流行倡導的一種新產業，是「文化產業」，認為歷史文化是文化創意的重要資源。如此看來，沈老在這方面的考慮和發言，整整領先了半個世紀。不能不讓人佩服！

由於我們在八十年代初，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成功合作出版了《紫禁城宮殿》和《國寶》等大型畫冊，沈老多次語重心長的對我說，希望我說動北京故宮，一同合作有系統地出版故宮的藏品，以公諸於世作研究之用，並以饗社會大眾。在世紀之交，北京故宮與香港的商務印書館終於完成了《故宮博物館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龐大文化工程的出版。相信可以告慰沈從文先生的囑願了。

原載王亞蓉編著：《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